

工作论文

SSL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No. 033-20160511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该文即将公开发表，如引用，需注明出处并征得本实验室（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或作者本人的同意——编者的话

从“高龄少子”到“全面两孩”：必然的历史与历史的必然 ——基于“人口转变”的国际比较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Email: zhengbw@cass.org.cn

【摘要】：根据党的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刚闭幕的“两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决定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中全会做的“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中使用了“高龄少子”来描述中国人口结构特征，并以此来阐释全面放开两孩的依据。文章对“高龄少子”做出概念解析和指标分析，用大量数据对中国高龄少子的人口结构特征做出详尽分析，在对发达国家高龄少子的诸多指标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广泛采取的家庭政策和移民政策进行了详细介绍后认为，全面放开两孩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在新常态下，对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压力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意义，它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只是充分条件。在对“人口转变”进行理论史回顾之后，文章对世界不同地区人口转变所处的不同阶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实现

三个阶段的跨越，成功实现人口转变，是必然的历史；当前全面两孩政策符合人口转变的要求和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高龄少子化 计划生育 人口转变 全面两孩

【作者简介】：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720）

供给侧改革：降费对社会保险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关于全面放开两孩的决定，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做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重要决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中全会做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总书记使用的“高龄少子”概念不仅准确地描述了我国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同时，也成为解释全面放开两孩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全面放开两孩是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变化，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内涵的一次重大调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高龄少子”：中国人口结构逆转势不可挡

（一）“高龄少子”的概念与定义

“高龄少子”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特征，也是一个趋势。少子化与老龄化是两个不同概念，二者相连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不同时发生在一个经济体之内。在不考虑移民等外部因素的静态条件下，导致老龄化的因素大致有两个：一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改善等，人口寿命预期延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寿风险”；二是在人口寿命预期既定的情况下，少子化将导致人口结构发生逆转。

至于人口老龄化，其测度方式较多，比如，一般指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以上，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7%以上；还可使用一个较为宽松的“老龄指数”（ageing index）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即 65 岁及以上人

口占每 100 个 15 岁及以下人口的比例，例如，2000 年只有日本等几个国家的老龄指数超过了 100，但到 2030 年，所有发达国家都将超过 100，届时，日本等几个国家将超过 200¹。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有三个：总和生育率较低、寿命预期较长、存活率较高。一般来说，前两个因素更可形象地成为人们测度的方法。

“总和生育率”（TFR）是指某国或地区妇女在育龄期内，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这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和指标，一般来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是“2.1”，如将其转化为 0-1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 18% 左右；或指“少儿抚养比”（0-14 岁人口占 15-64 岁人口的比例）偏低，如将总和生育率“2.1”转换为少儿抚养比，25% 可视为少子化的一个标志；还可用“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等其他指标来表示少子化。目前，国际上对“少子化”的量化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从研究角度看，低于 2.1 的总和生育率被认为少子化的重要含义。

“寿命预期”（life expectation）也称为平均预期寿命，一般指零岁年龄组人口的平均可存活年数，是常用的预期寿命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平均寿命延长与少子化的关系不大；少子化是指寿命预期既定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等指标明显下降，意味着老龄人口占比逐渐提高，超过警戒线就会导致人口结构逆转，进而导致老龄化。

如果一经济体的人口结构两个逆转趋势同时出现，即一方面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寿命预期不断延长，就说明少子化和高龄化在一经济体同时出现，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在国际上，日本是老龄化和少子化两个特征十分明显的国家，因此，少子化概念在日本十分流行，在很多报刊论文中，人们干脆将其合二为一，称其为“高龄少子化”，甚至在日语里汉字里，“少子化”和“高龄少子化”常常成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在英语里，少子化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和普及远不如日语，且术语表达方式有很多种。但是，baby bust（少子化）与 baby boom（婴儿潮）形成对仗关系，应该是最为典型的表达形式。

（二）中国人口“高龄少子”发展十分迅速

中国人口过早地出现了明显的“高龄少子”趋势。从老龄化的趋势来看，2001

¹ Leonid A. Gavrilov and Patrick Heuveline(2003), Aging of Population, in Paul Demeny and Geoffrey McNicoll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Popu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就超过了 10%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那一年正是中国人均 GDP 刚刚跨过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人均 GDP1000 美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 GDP1000 美元还被称之为“贫困陷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典型的未富先老。195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 7.5%，1980 年是 7.2%，30 年里变化不大。但在最近 25 年来，老龄化趋势急转直下：1990 年提高到 8.2%，2000 年是 9.9%，2010 年 12.4%，2015 年 15.2%。由此看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不能不说，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的投入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寿命提高十分明显：新中国刚建立时人均寿命只有 43.4 岁，1980 年提高到 65.2 岁，2015 年又提高到 75.4 岁，改革开放以来就提高了 10 岁。而发达国家 2015 年人均寿命仅为 78.3 岁，就是说，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其人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从少子化现象来看，形势更为严峻。2010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53，而这一年中国则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 GDP 为 1000-4200 美元以下），相比之下，当年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则高达 3.08，“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为 4200-13500 美元）总和生育率是 1.82，“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 在 13500 美元以上）的总和生育率是 1.76。换言之，在刚迈进“上中等收入”的 201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这三组经济体的总和生育率，即由于抚养成本等多重原因，中国夫妇的生育意愿已经十分低下，就连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

就“少儿抚养比”而言，在中国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组的 2010 年，这个数字是 23.4%，而“下中等收入”组的平均值是 51.6%，中国低一倍还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中等收入”组是 30.0%，高收入组的是 25.9%。换言之，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与总和生育率的情况完全一样，低于所有三组经济体（“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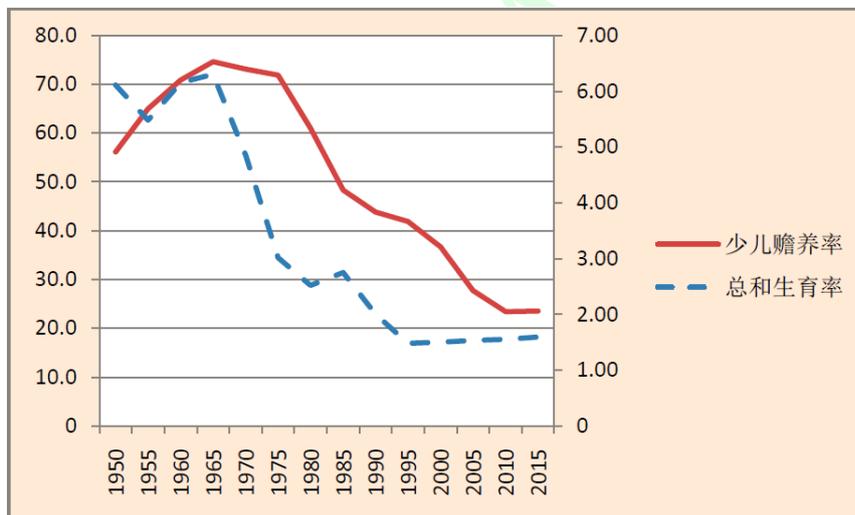
（三）中国人口“高龄少子”的主要推手

由于计划生育等原因，中国总和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这两个曲线都经历了十分陡峭的断崖式下降拐点（见图 1）：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 1965 年是生育高

² 本文引用的数据，除注明的之外，全部引自联合国人口司的网站（<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下文不再专门说明。

峰，其总和生育率达 6.30，此后不久便直线下滑，到 1975 年下降到 3.01，1980 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子时继续下降到 2.52，1990 年再次下降到 2.00，到 2000 年下降到谷底 1.48；可能由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等原因，到 2015 年略回升到 1.55。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还显示（见图 1），少儿抚养比的曲线与总和生育率同步，非常吻合：高峰也发生在 1965 年，高达 74.6%，1975 年下降到 71.9%，这年是断崖式滑坡的拐点，此后便直线下滑：1980 年降到 61.0%，1985 年滑至 48.3%，1990 年持续降至 43.8%，2000 年 36.7%，2005 年降到 27.7%，到 2010 年再次降到谷底 23.4%。在半个世纪里，少子化现象就变得如此严峻，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重要的是，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做调整，中国的少子化高峰还未到来。

图 1 1950-2015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网站：<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

上述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告诉人们，虽然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但是，人口结构的逆转发展趋势是“超高速”的，其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受到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受到一定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正成为典型的“高龄少子化”国家，调整人口政策势在必行；二是老龄化十分严峻，但少子化趋势更为严峻，它是中国人口急剧老龄化主要推手，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已显得十分迫切。正是在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中国人口结构才有了急剧逆转的势头，60 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 2015 年上升到 15.2%。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显示，老龄化来势凶猛，但在“独生子女”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少子化趋势更为严峻（主要在城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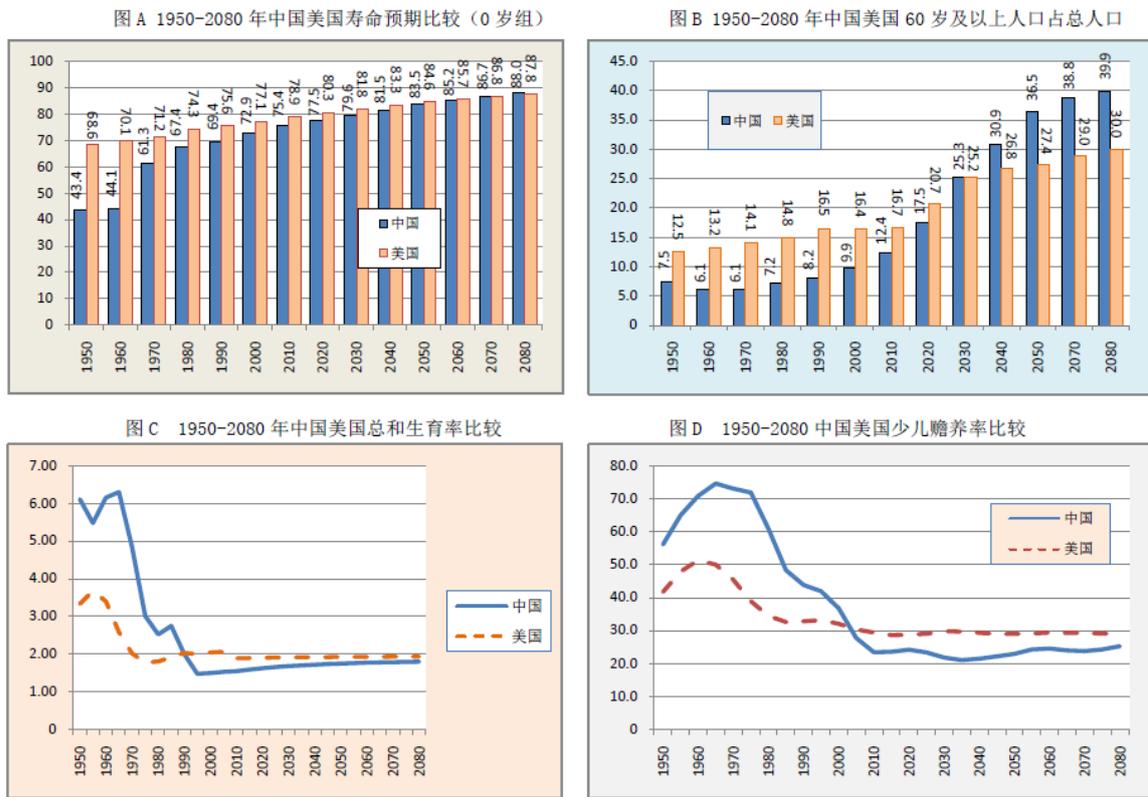
同), 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便提到决策层案头。

(四) 国际比较视角下中国人口未来“高龄少子”预测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 如果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做调整, 未来人口“高龄少子化”的趋势将十分严峻, 并“后来居上”超过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甚至有些指标比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更为严峻。例如, 在 2015-2100 年的未来 85 年里,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这两个指标将始终低于英国和法国, 少子化现象将导致人口绝对数量直线下滑, 到 2100 年降至 10 亿人。另一方面, 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十分接近英国和法国: 到 2080 年, 中国人均寿命预期(零岁组, 下同)为 88.0 岁, 而英国为 89.5 岁, 法国为 91.1 岁。

中国经济总量排名第二, 仅次于美国。在未来有一天, 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将毫无悬念。为此, 这里有必要将中美人口未来“高龄少子化”的走势予以详细比较(见图 2), 以此来看中国人口结构所面临的劣势。先看寿命预期: 2015 年中国人均寿命预期大约是 76 岁, 美国是 79 岁, 这个差距在未来 85 年里始终处于不断缩小的进程之中, 到 2100 年中国将正是超过美国, 即中国为 89.9 岁, 美国是 89.3 岁。再看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2010 年中国仅为 12.4%, 而美国是 16.7%, 但拐点发生在 2030 年, 届时中国是 25.3%, 美国是 25.2%; 此后, 中国的这个比值持续攀升, 将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到 2080 年中国高达 39.9%, 而美国仅为 30.0%, 相差十分悬殊。上述两个老龄化指标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描述令人瞠目结舌, 尤其是老年赡养率, 它充分显示出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下面两个少子化指标将进一步说明, 少子化将不仅加剧人口结构的逆转趋势, 而且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峻的负面作用。

图 2 1950-2080 年中国人口“高龄少子”比美国更为严峻



二、适应新常态：“全面两孩”的社会经济意义

（一）全面放开两孩的及时性和必要性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全面放开两孩的政策呈现出渐进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在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单独两孩”时，有关方面估计³，在符合生育两孩政策的 1100 万人中，第一年大约能有 200 万申请生育二胎，但结果却大大低于预测值，提出申请的仅为 69 万人。截止 2015 年 8 月底⁴，申请生育二胎的夫妇为 169 万对，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中仅占 15.4%。现在的生育主体是 80 后、90 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已明显发生变化，养育孩子成本也明显增加，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之后，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在不断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因此，全面放开两孩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将决定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时俱进。

实施全面两孩，这是非常及时且非常必要的，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新常态下，及时准确地调整人口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从某个角度讲，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决定。在经过 2013 年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两孩”政策的“测试”之后，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正式作出全面放开两孩的决定，这是非常及时的，非常正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中全会做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所指出的，全面放开两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针对高龄少子化对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的新挑战，全面放开两孩无疑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一个重大举措。据有关学者估算⁵，如果不实行全面两孩，到 2030 年人口规模为 14.1 亿，但全面放开两孩就会达到 14.5 亿，这 4000 万人到 2050 年将成为劳动力。

（二）全面放开两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含义

首先，针对“高龄少子化”来说，全面放开两孩将是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举

³ 记者戴玉：《全麦呢两孩政策背后的数据迷局》，载《南风窗》杂志，2015 年第 24 期。

⁴ 引自“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⁵ 杨志锦、廖丽颖：《实施全面两孩，2050 年劳动力增加三四千万——专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载《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3 月 9 日，第 06 版。

措。在长寿风险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要普遍面对的社会风险之一的趋势下，除了移民，生育政策调整将是唯一可行的重要举措。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将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人口规模将不断缩小：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做调整，中国的人口规模峰值为 2030 年的 14.155 亿，此后将逐年减少，2040 年减少至 13.947 亿，2050 年 13.481 亿，2060 年 12.768 亿，2070 年再次降至 11.975 亿，2080 年为 11.226 亿，2090 年 10.551 亿人；重要的是，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 36%，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发展处于失衡状态，人口安全和民族昌盛受到挑战，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崛起处于战略劣势，甚至受到威胁；进而，经济和社会安全也受到严峻挑战。综上，及时全面放开两孩是主动顺应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对扭转人口发展失衡状态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意义，对国家安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其次，就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讲，全面放开两孩是较长时期内一个治本的办法。其实，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早已初露端倪。在英文中有这样一句老话：“人口学就是经济学”（Demographics are economics）。2 个世纪前，马尔萨斯曾有一句名言：“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增长的经济和增长的税收”。众所周知，少子化必然导致劳动供给下降，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情况下，必将减少劳动产出，必将影响经济增长。大家知道，早在 2005 年，沿海一代就开始出现“用工荒”，后来逐渐蔓延到内地，劳动价格随之逐年攀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沿海制造业面临困局。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少子化催生了新常态的提前到来，东北三省经济大面积滑坡就是一个明证：其就业人口外流导致其经济增长乏力。对刚刚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新常态下，全面放开两孩是撬动经济增长、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和顺利进入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杠杆。

再次，有利于撬动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在少子化趋势下，劳动就业人口占比将逐渐下降，进而，人口规模将呈绝对下降趋势，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劳动供给减少必将减少劳动产出，经济增长必将受到影响。对产业结构也将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乳制品业、食品加工业、玩具和电子游戏产业、房地产等，他们将不得不调整消费群体对象，或转产或限产，或产业升级等。在短期内，两孩政策蕴含的消费潜力将逐年释放，并将形成稳定

的上升曲线，对相关的食品玩具、婴儿服饰、妇婴保健、教育行业等起到拉动作用；中期看，房地产需求将有所刺激，水泥、钢铁等相关产业也将受益，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发掘，增长预期将出现利好；长期看，两孩政策无疑会对楼市等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对老龄化趋势下楼市价格下滑趋势具有一定的对冲作用，进而对其他资产价格也都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在进入新常态这个关键时刻，全面放开两孩无疑是撬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杠杆。

最后，作为社会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有利于稳定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全面放开两孩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和人民长期福祉的要求，在新常态下，是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这是因为，进入新常态之后，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必将减少，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支出能力必将受到明显约束，进而将有可能诱发产生其他不利的社会因素，甚至出现社会动荡，从很多国家的教训来看，这时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明显增加，例如，养老金支出、老年护理与老年医学的支出规模、老年服务设施支出的投入规模等，都将持续提高，另一方面，少子化将影响社会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产生明显的“置换”效应。例如，对妇儿科医院、中小学教育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对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将形成使用效率问题。相应地，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就业机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少子化的预期必然是老龄化，大量“腾退”的校舍医院等社会基础设施，将更多地被养老院所“占用”。

三、“高龄少子”：国际比较与政策选择

（一）国外“高龄少子”现状与特征

在考察国外高龄少子化时，人们往往会发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些人口现象不乏带有一定的规律性，给人们以启迪。

首先，人们会经常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考虑战争、饥荒和瘟疫等特殊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们的生育意愿却逐渐下降，而不是相反。在一个经济体之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一般来说，伴随的将是总和生育率的逐渐下降，同时，少子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例如，1900年美国总和生育率是3.5，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1933年下降到2.3。

战后在 50 年代出现了婴儿潮，总和生育率高达 3.7，但到 70 年代又下降到 2.0，2015 年再降到 1.89。

其次，人们还会看到一个有趣现象：高寿命预期往往与低生育率连在一起，且基本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而低寿命预期则经常伴随着高生育率，成为低收入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或说，在发达国家，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普遍存在并十分严峻，而欠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是人口年轻和多子现象并存。2015 年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人口数据显示，世界平均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 2.51，而高收入国家只有 1.75，其中，英国是 1.92，法国 2.0，德国 1.39，荷兰 1.75，意大利 1.43，西班牙 1.32，加拿大 1.61，美国 1.89，日本是 1.40，俄罗斯是 1.66。比较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高达 5.10，南亚是 2.56，拉美是 2.15。而“少儿抚养比”世界平均水平是 39.7%，其中高收入国家只有 26.0%，例如，英国和法国分别是 27.6%和 29.6%，德国是 19.6%，荷兰 25.3%，意大利 21.5%，西班牙 22.4%，加拿大 23.5%，美国 28.6%，日本是 21.1%，俄罗斯是 24.0%。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 79.8%，南亚 45.4%，拉美 38.6%。

最后，人们还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人口现象：世界各国总和生育率的分布情况昭示，虽然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均为少子化国家，但其少儿抚养比却高达 26%，大大好于总和生育率，甚至英、法、美等国已不属于少子化国家。这是因为，战后以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实施了鼓励生育和鼓励移民的政策选择，旨在抵御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缓解人口结构逆向发展趋势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我们对发达国家采取的鼓励生育和鼓励移民政策进行详细分析。

（二）发达国家应对“高龄少子”的措施之一：鼓励生育

采取和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生育，这是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传统办法。在这方面，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做出了许多努力，有些国家的做法值得注意。例如，在法国，生育的越多，经济补贴就越多，所以，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非常发达，支出占 GDP 比重非常高，鼓励生育是其家庭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法国⁶，“家庭政策”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避免有子女和无子女家庭的生活水平不要出现两个极端；二是确保所有的儿童有一个最多的生活保障，不管家庭子女

⁶ Rejane HugounenQ et Henri Sterdyniak(1999), Pour la Politique Familiale, in *Economie Publique*(semiyearly), published by L'Institut d'Economie Pubulique, No.1 , pp.17-48.

多还是少。法国家庭政策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包括普惠式的现金转移支付（分为家庭补贴、家庭补充补贴等两项）、各种各样的家计调查式津贴（分为开学补贴、单亲补贴、家庭支持津贴、残疾儿童津贴、过继补贴、儿童少年补贴、家长教育津贴、保姆津贴、家庭自我抚养补贴等将近 10 项）、五花八门的减税措施等三小类。初步统计，1996 年法国家庭政策分为 13 项目，总支出为 2020 亿法郎。众所周知，战后以来，法国“家庭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鼓励生育，确保人口发展平衡，例如，其家庭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每多生一个小孩，就多一份子女补贴，所以，多生几个小孩获得的补贴就足以使她们愿意甘心在家担任专职主妇，甚至以生小孩为生。OECD 将家庭政策虽然也分为三小类⁷，但分为现金津贴、公共服务和家庭减税，2007 年其 33 个成员国平均支出占 GDP 为 2.2%，按支出规模占比排序，最高的是法国，占 GDP 的 3.71%，最少的是意大利，占 1.40%（见表 1）。

表 1 OECD 部分成员国“家庭政策”的支出（占 GDP，2007 年）

国家	现金津贴	公共服务	家庭减税	合计
法国	1.33	1.66	0.72	3.71
丹麦	1.48	1.80	0.00	3.28
瑞典	1.49	1.86	0.00	3.35
德国	1.09	0.75	0.88	2.71
意大利	0.65	0.75	0.00	1.40
西班牙	0.52	0.71	0.24	1.47
英国	2.13	1.11	0.33	3.58
OECD33 国平均	1.22	0.78	0.25	2.20

资料来源：Dang Ai-Thu, Jean-Marie Monnier (January 2011), Gender Regimes and Welfare States in Franc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 2011-40 of CNRS UMR 7235, Universite de Paris Quest Nanterre La Defense.

（三）发达国家应对“高龄少子”的措施之二：鼓励移民

实施积极的移民政策是发达国家应对高龄少子化的另一个重要政策选项，旨在弥补家庭政策的不足，缓解高龄少子化的发展趋势。

战后以来，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实行一定的移民政策，“纯粹”的非移民国家已基本不存在（除朝鲜等极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因此，对很多发

⁷ Dang Ai-Thu, Jean-Marie Monnier (January 2011), Gender Regimes an Welfare States in Franc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 2011-40 of CNRS UMR 7235, Universite de Paris Quest Nanterre La Defense.

达国家而言，虽然总和生育率低，但其少儿抚养比却很好；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总和生育率虽然不高，但其少儿抚养比却较为理想，因此，2015年北美的人口老龄化程度（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下同）仅为20.8%，其中，加拿大是22.3%，美国是20.7%。对那些非移民国家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发达国家里，日本是移民数量最小的国家之一，因此，其总和生育率与少儿抚养比都很低，其老龄化程度高达33.1%，居世界之首。因此，为缓解老龄化，近年来，日本移入人口的数量明显增加，例如，2013年日本的移入人口高于法国和意大利等传统的移民大国。但总体看，欧洲的老龄化低于日本，但高于北美，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老龄化22.1%，更高于亚洲和非洲：西欧是26.0%，北欧23.4%，其中，德国27.6%，法国是25.2%，西班牙24.4%，奥地利24.2%，比利时24.1%。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婴儿潮即将进入退休年龄，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移入人口进入新高潮，全世界移民数量激增。在1990-2013年，移民数量从1.54亿增加到2.32亿，增加了50%，而同期全球总人口从53.2亿增加到72.0亿，仅增加了35%，这说明，移民的增长率要快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为解决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困境，一些国际机构在跨国层面积极鼓励其成员采取积极的移民措施，其中，欧盟的做法受到国家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战后以来，随着欧洲各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峻，欧洲各国的移民政策日趋活跃。欧盟（EU）成立之后，多次颁布指导性文件，鼓励成员国实施积极的移民政策。例如，2007年欧盟颁布了著名的《共同移民政策：原则、行动与工具》⁸，其开宗明义地认为，“欧洲引入移民是一个现实”。截止2006年1月1日，移民已占欧洲欧盟人口的3.8%，为1850万人，仅在2002-2007年，每年的新移民就达200万人。该文件提出了10条共同原则，即3个繁荣原则，3个团结原则和4个安全原则；该文件制定了两条具体行动纲领，即在欧盟和成员之间协调一致和确保透明与相互信任。欧盟认为，移民政策对欧洲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十分明显：据预测，欧洲经济活动人口是2.35亿，到2060年，即使在目前移民政策和移民规模的条件下，欧洲工作人口的数量要减少5000万人，如果没有移民政策，将减少1.1亿，这将对欧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形成巨大威胁。

⁸ A Common Immigration Policy for Europe(17.6.2008): Principles, actions and tool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2008) 359 final, Brussels. 见 <http://eur-lex.europa.eu/>

八个高收入国家的移民数据具有典型意义：战后以来，八国（G8）的“净移入人口”（移入人口减去移出人口）高达 8700 万人，其中，加拿大移入 932 万人，法国 686 万，德国 956 万，意大利 275 万，日本 265，西班牙 453 万，英国 401 万，美国 4735 万人。为应对高龄少子化，在未来的 65 年里，八国需要净移入人口可能高达 1.1 亿，其中最少的依然是日本 299 万人，最多的还是美国，高达 5975 万人。

一般来说，高收入国家均为“净移入人口国”，而“净移出人口国”几乎均为欠发达国家。比如，阿尔及利亚是典型的“净移出人口国”（是法国主要移入人口来源国之一），战后以来移出人口达 255 万，再如，印度移出人口 570 万，等等。“净移民率”（net migration rate）是衡量移入人口强度的一个指标，其含义指每千人的移民数量。战后以来，八国的“年均净移民率”最高的国家是加拿大，达 5.7，美国位居第二，为 2.9。日本是“净移民率”最低的国家，仅为 0.3。

表 2 八个主要发达国家移民数量（万人）

国家	年均净移民率	1950-2015 年 净移入人口	2015-2080 年 预计净移入人口
加拿大	5.7	932	1205
法国	2.0	686	478
德国	1.9	956	896
意大利	0.7	275	603
日本	0.3	265	299
西班牙	1.5	453	529
英国	1.0	401	1021
美国	2.9	4735	5975
合计	2	8703	1100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网站数据（<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计算。

四、“全面两孩”：只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一）计划生育仍是基本国策

面对来势汹汹的“高龄少子化”的人口发展趋势，2013 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两孩”政策；2015 年底党的五中全会在十三

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现在，在刚闭幕的“两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做出全面两孩的决定。由此看来，全面放开两孩是对“单独两孩”政策连调的结果，其本质仍属于计划生育的范畴，正如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所指出的“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作为基本国策，35年前，“一孩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对缓解资源约束和实现两次经济腾飞（第一次是2001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实现摆脱“贫困陷阱”的跨越；第二次是2010年人均GDP超过4100美元，实现摆脱“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功不可没，对当前人均GDP能够登上“上中等收入”台阶做出重大贡献。

2015年GDP增长率为6.5%，首次破7%。在新常态下，如果保持这个增速，在考虑到全面放开两孩的条件下，2023年人均GDP将超过13000美元，就是说，在十四五规划末，中国将正式成为“高收入”国家。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决定着我們能否按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全面放开两孩只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展望未来，计划生育从“一孩政策”过渡到“两孩政策”具有现实的客观性，如果能够迎来两孩婴儿潮的到来，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供给侧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的增加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为此，有关报章媒体对全面放开两孩充满期待。

但众所周知，全面放开两孩，调整人口结构，只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增长能否真正实现，增长质量能否得到保证，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果经济政策失误，社会政策失当，即使人口持续年轻化，人口红利始终伴随，经济增长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现，反而会出现回落、徘徊和下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国际经验显示，凡是“高收入”（13500美元以上）国家，几乎都是高龄少子化的国家；凡是长期陷入“贫困陷阱”或刚刚爬出“贫困陷阱”（人均GDP为1000美元）的国家，人口结构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这说明，人口结构条件只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正确和恰当的政策和制度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因素。

（三）从正反两方面案例看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联合国 1950-1990 年的数据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战后以来人口结构虽然也处于老龄化的进程之中，但总体看还非常年轻，正值人口红利期，其总和生育率从未低于 3.45，最高时超过了 5.00，少儿抚养比从未低于 60%；其中，阿根廷总和生育率从未低于 3.00，最高时达 3.44，少儿抚养比从未低于 40.0%，最高时达 51.0%；巴西的这两组数据更好，其总和生育率从未低于 5.00，最高时超过 6.15，少儿抚养比更高，从未低于 50%，最高竟超过 80%。但是，拉美地区却长期以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地区，究其原因，盖因为失败的经济政策和糟糕的社会政策。

相反，二战之后的 1950-1990 年里，日本和德国等国家面临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困扰之中，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40，少儿抚养比仅为 21.1%，德国的这两组数据更低，分别只有 1.39 和 19.6%，但是，这两个国家很快就从战败中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佼佼者。其他诸如香港、韩国、新加坡、卢森堡和瑞士等一些小中型经济体，他们的少子化趋势也十分严重，其总和生育率依次只有 1.20、1.26、1.23、1.57 和 1.52，少儿抚养比分别只有 16.4%、19.2%、21.4%、23.6% 和 22.0%。可以说，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远不如拉美国家，但是，由于他们制订和实施了恰当的经济政策和得当的社会政策，不仅早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而且今天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论坛历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排名中名列前茅。

五、“全面两孩”：顺应“人口转变”大趋势

（一）“人口转变”理论模型的演变

首次使用 Demography（人口统计学）这个术语的是操法语的比利时学者圭亚尔（Achille Guillard）⁹，在其 1855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里，他首次将出生率和死亡率引入到人口发展的内部动力分析之中，由此开启了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转变机制的研究起点。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很多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等沿着圭亚尔的分析路径，对生育率、死亡率、寿命预期、人口总量等人口结构特征的变化和人口再生产趋势进行不断的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人口转变”（DT，demographic transition）理论。

⁹ Institut National d'Etudes Demographiques, http://www.ined.fr/en/everything_about_population/demographic-facts-sheets/focus-on/achille-guillard/

人口转变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将人口再生产过程或称人口结构与规模的发展过程划分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概括起来，经典作家大致将人口转变划分为 3 个阶段¹⁰：一是“前转变”阶段，其特征是持续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均衡阶段；二是“转变”阶段，其特征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人口规模激增；三是“后转变”阶段，其特征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均衡”阶段，人口规模出现静止或衰减。汤普森（Thompson）教授是最早提出三阶段划分的学者¹¹，1929 年他将之分为“前工业”阶段、“扩展”阶段和“稳态”阶段。1934 年法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兰德里（Landry）教授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之为“原始制度”、“过渡制度”和“当代制度”¹²，他认为不存在“最终的均衡”，恰恰相反，只有“永恒的不稳定”，其中“超低生育率”就是如此。1945 年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诺特斯坦（Notestein）教授侧重年龄结构对人口增长的影响¹³，将三个阶段描述为“高增长潜力”、“转型增长”和“潜力下降”，并将三阶段划分的转变过程予以理论化，成为人口转变理论的完成者。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上述三分法，赞成两分法即分成两个阶段，但并未成为主流，也未出现广泛的深入研究。但是，有学者扩展了三分法，将“人口转变”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1949 年著名的英国人口学家布莱克（Blacker）的五分法广受关注¹⁴，他将“转变”阶段一分为二：一是持续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但随即死亡率出现下降的阶段；二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阶段，但出生率略有高一些。他将“后转变”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的“双低”均衡阶段；二是超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但死亡率要高于出生率的阶段，这是人口转变的最后阶段，人口规模处于绝对的衰减趋势。实际上，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大维斯（Davis）此前也曾提出过几乎相同的五分法¹⁵，其内容几乎

¹⁰ 这里的内容主要参考了法国学者 Chesnais 教授的文献：J.C.Chesnais,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ncyclopede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 (EOLSS).

¹¹ Thompson, W.S.(1929):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6),959-75.

¹² Landry, A.(1934): *La Révolution démographique: études et Essais sur les Problèmes de la Population*, Paris, Librairie Sirey.

¹³ Notestein, F.W.(1945): *Population: the long view*, in E.Schultz(ed.) : *Food for the world* (Chicago, II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诺特斯坦教授 1936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人口研究所，1946 年帮助联合国建立人口处并担任第一任处长，1969 年该处扩大为人口司。

¹⁴ Blacker, C.P.(1949): *Stages of population growth*, the Eugenics Review, 39(3),88-101.

¹⁵ Davis, K.(1945): *The worl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73(Jan.), 1-11.

与布莱克的分析完全相同，但只对第五阶段的人口发展趋势略有不同看法，认为第五阶段的出生率很低但却较为稳定，略高于死亡率，所以，人口保持的是一个增长的态势，而不是衰减。

（二）“人口转变”分析框架的应用

在笔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过七、八十年的演变，当今世界人口结构现状、地域分布及其基本态势似乎用五分法来描述更为贴切和准确。为此，在综合经典作家描述的人口转变阶段特征的基础上，笔者绘制了图 3，将人口转变的“五阶段论”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特征的描述和定义予以更新或“为我所用”，并对案例国家或地区人口予以典型性归纳。

图 3 “人口转变”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人口双高 均衡阶段	早期人口 膨胀阶段	后期人口 膨胀阶段	人口双低 均衡阶段	人口绝对 衰减阶段
高出生率， 但波动性大	高出生率	出生率略有所 下降	低出生率	超低出生率
高死亡率， 但波动性大	高死亡率， 但呈下降趋势	死亡率明显下 降	低死亡率	低死亡率，但高 于出生率
-	1970 年以前 的撒哈拉以南 非洲和部分其 他地区	1970 年以 来的撒哈拉非洲 和部分亚洲地 区等	西欧、南欧、 北欧、北美和 韩国等高收入 经济体	日本和德国等 少数发达国家 初露端倪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对第一和第二阶段来说，它们显然已经成为历史。第一阶段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双高”均衡发展阶段应发生在 19 世纪之前。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第二阶段也已成为历史，似乎撒哈拉以南非洲刚刚走出这个阶段且有完整数据可供考察，例如，在 1970 年之前，这个地区人口仍处于早起人口膨胀时期，其典型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继而呈下降趋势。1950-1970 年该地区的出生率始终保持在 47‰高位不变，而死亡率则从 1950 年的 27.8‰逐渐下降到 1970 年的 20.0‰，同期人口则从 1.8 亿人激增至 2.8 亿。概而言之，第一和二阶段已成为过去，只有后三个阶段正当其时，可进行讨论，其中，对个别国家而言，其第五阶段特征初露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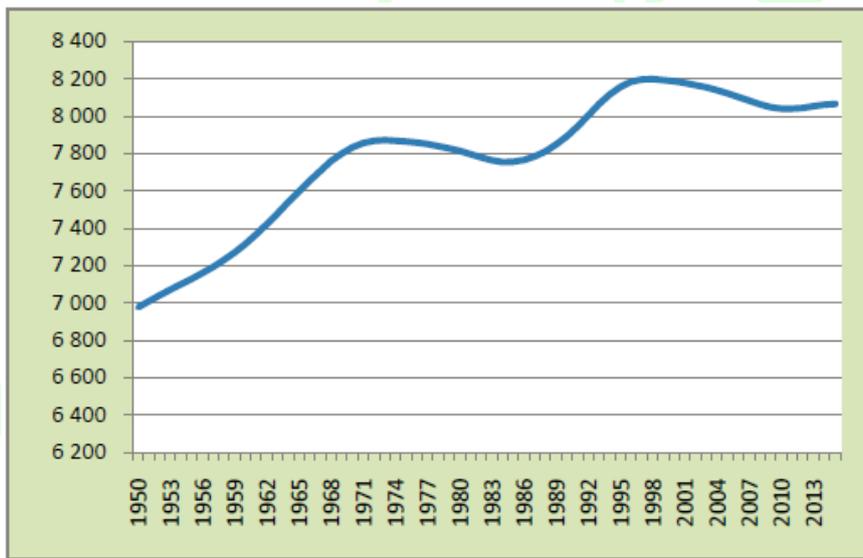
第三阶段为后期人口膨胀阶段。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皆处于这个历史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站在不同的台阶上。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刚刚进入这个历史阶段，站在较低的台阶上：1970-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生率略有下降，从1970年的46.0%降到2015年的37.9%；同期的死亡率下降较为明显，从1970年的20.0%降到2015年的10.6%；人口数量急剧膨胀，从2.8亿激增至9.6亿。相比之下，南美大陆国家处于较高的发展台阶上，其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更为明显，例如，出生率从1950年的41.4%，直降到2015年的16.8%，大大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死亡率从1950年的15.1%下降到2015年的6.1%，也明显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规模迅速增加，从1.1亿增加到4.2亿。如果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大陆是频谱的两个极端，亚洲、中东和中东欧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二者之间的不同台阶之上。

第四阶段为人口双低均衡阶段。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双低”特征是第四阶段的重要特征，随着人口规模逐渐缩小，最终处于静止发展状态。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都处于这个阶段。其中，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进入这个阶段；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这些国家的“双低”特征更为明显。就出生率来说，1970年西欧、南欧和北欧分别是17.2%、21.1%和16.4%，到2015年分别下降到10.2%、9.1%和12.3%，北美从24.6%下降到12.4%；死亡率从西欧、南欧和北欧的11.5%、10.8%和11.3%，分别下降到9.7%、9.7%和9.4%，北美从9.6%降到8.1%；上述“双低”特征本来与人口静止状态应该十分吻合，但实际上由于移民（包括难民）等因素，这些地区的人口规模略有增长，1950年西欧、南欧和北欧的人口是1.4亿、1.1亿和7800万，到2015年增加到1.9亿、1.5亿和1.0亿。由于美国的出生率稍高一些，重要的是其移民规模十分可观，所以，北美的人口从1970年的1.7亿增加到2015年的3.6亿。

第五阶段为人口绝对衰减阶段。虽然第五阶段是对未来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而不是现实，但是，极少数发达国家已初露端倪。例如，日本出现超低出生率，2000年以来始终在9.0%以下，2015年跌至8.3%，是发达国家出生率最低的国家，而高收入国家同期的出生率为12.0%左右；2010-2015年日本的死亡率是10.0%，略高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出生率，也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死亡率

9.0%的水平。1950年以来，日本的人口规模始终处于稳定增加的趋势：从1950年的8200万增加到2009年的峰值1.2734亿，随后便出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从2010年到2015年其人口每年分别是1.2732亿、1.2725亿、1.2714亿、1.2698亿、1.2679亿、1.2657亿，6年共减少77万人，重要的是，每年减少的人数不断增加：从2010年减少2万人，到7万、11万、16万、19万和2015年的22万人。须知，这是在日本2010-2015年引入移民35万的基础上减少的数量，否则，每年下降幅度还会更大，2010-2015年合计将减少112万。其实，德国人口与日本一样，也出现第五阶段的某些特征，例如，其出生率和死亡率均与日本相差无几，甚至2015年的出生率也是8.3%，但是，由于其战后移民数量是日本的3倍多，仅2010-2015年的移民就高达125万，情况就好很多，尤其是1985-1995年引入移民达494万，致使德国人口增长出现波浪状（见图4）。

图4 1950-2015年德国大量移民导致人口增长呈波浪状（万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网站：<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

（三）“全面两孩”符合“人口转变”的规律

人口转变理论主要是对历史事实及其规律性做出的总结归纳，而不是理论演绎和过程推导；通过考察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阶段性的关系，人口转变理论发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对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具有终极的影响；人口转变是指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人口原有的均衡状态不断被打破而实现新的均衡，是指人口再生产逐渐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逐步向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的过程，即人口再生产过程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或说，人口转变的内在动力在于承载人口变迁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技术创新等诸多条件的演进，这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作用于人口转变的自然法则。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短短 67 年里，就成功地实现了从“双高”到“双低”的人口转变，实现了三个阶段的跨越。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建国之初的人口正处于第二阶段，1950-1965 年的出生率为 40%左右，死亡率 22%左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转变进入第三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到 80 年代初分别下降到 21.4%和 6.6%。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率急剧下降到 2015 年的 12.4%，死亡率是 7.0%。换言之，在强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 35 年里，中国人口发展从第三阶段迅速进入到第四阶段。与国外坐等社会经济自然演变而自动实现人口转变有所不同，中国利用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优势，采取主动干预的强制性措施，促使加快人口转变，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转变，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未富先老”。当然，实施一胎政策的 35 年正是经济增长奇迹的 35 年，如果说前者成为人口转变的人为因素，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人口转变的客观条件，即中国利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历经的人口转变，这也是一个奇迹。当一胎政策导致老龄少子进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时，人们发现，社会经济发展不仅会作用于人口转变，人口转变也将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于是，一孩政策转向全面两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既然人口转变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当前的全面两孩也好，未来的全面自主生育也罢，甚至将来全面鼓励生育，只要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人口转变并最终进入第四阶段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生育政策全面改革，既可大力发展经济，又能实现人口转变，这是一个双赢途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全面两孩既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更符合人口转变的规律。

主要参考文献：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的说明》。

记者戴玉：《全面两孩政策背后的数据迷局》，载《南风窗》杂志，2015 年第 24 期。

杨志锦、廖丽颖：《实施全面两孩，2050 年劳动力增加三四千万——专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载《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3 月 9 日，第 06 版。

A Common Immigration Policy for Europe(17.6.2008): Principles, actions and tool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2008) 359 final, Brussels. 见 <http://eur-lex.europa.eu/>

Dang Ai-Thu, Jean-Marie Monnier (January 2011), Gender Regimes an Welfare States in Franc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 2011-40 of CNRS UMR 7235, Universite de Paris Quest Nanterre La Defense,.

Leonid A. Gavrilov and Patrick Heuveline, Aging of Population, in Paul Demeny and Geoffrey McNicoll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Popu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3.

Rejane HugounenQ et Henri Sterdyniak(1999), Pour la Politique Familiale, in *Economie Publique*(semiyearly), published by L'Institut d'Economie Pubulique, No.1, pp.17-48.

联合国人口司网站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

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CISS CASS, 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 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努力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 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究资源和人才队伍, 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直接领导, 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 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其中,《快讯》、《社保改革动态》和《社保改革评论》三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 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 否则, “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 未经作者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引用作者观点, 可注明出处。否则, 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工作论文》,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北京 1104 信箱 (邮编 : 100007)

电话：(010) 64034232

传真：(010) 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